

杨航. 灾害应对过程的社会韧性研究——基于滇西北金沙江上游灾害应对的考察[J]. 灾害学, 2023, 38(3): 30–33, 59.
[YANG Hang. Research on Social Resilience in Disaster Response Process——Investigation on Disaster Respons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Jinsha River in Northwest Yunnan[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 2023, 38(3): 30–33, 59. doi: 10.3969/j.issn.1000–811X.2023.03.005.]

灾害应对过程的社会韧性研究^{*}

——基于滇西北金沙江上游灾害应对的考察

杨 航^{1,2}

(1.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2. 四川省地震局,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基于人类学关于灾害应对的社会韧性研究的文献资料及滇西北金沙江上游区域的长期田野调查, 该文探讨应灾知识、权力关系、信息传播因素与当地灾害应对过程中社会韧性营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在一定条件下, 知识、权力、信息三个维度对社会韧性营造具有关键作用。知识层面, 本土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不断交替与融合以及受灾主体对知识体系合理的排序与判断; 权力层面, 构建多链接的、上下联动、充分重视横向关系的组织架构, 并充分关注受灾主体的社会关系; 信息层面, 各传播主体能够顺畅互动, 信息深度融入受灾主体内部, 形成最大共享机制。灾害应对的社会韧性提升, 需应灾知识、权力和信息三者间构成一个良性互动关系。未来韧性研究要注意到常态灾害与非常态巨灾、灾害应对的不同阶段社会韧性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形式。

关键词: 自然灾害; 应对过程; 社会韧性; 社区; 应灾知识; 权力; 信息

中图分类号: X43; X91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11X(2023)03–0030–05

doi: 10.3969/j.issn.1000–811X.2023.03.005

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逐步健全的当下, 灾害应对成为衡量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 如何提升应灾社会韧性成为学界与政府关注的问题。社会韧性研究为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助力各级政府及群众应对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各类灾害。与自然学科更侧重于物质(诸如建筑、公共设施、农作物等)韧性不同, 人类学对社会韧性的研究侧重于灾害与人的关系、人类社会在应对持续性灾害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形成的机制。然而, 现有研究在深入探讨本土情境下的社会韧性及社会韧性构成要件上还存在短板, 未能深入分析影响弹韧性的要素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基于此, 在梳理社会韧性概念和分析视角基础上, 结合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及调查研究, 深入探讨应灾知识、权力、信息与社会韧性之间关系, 并提出未来韧性研究的关键问题。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回顾与概念形成

英文“resilience”一词, 被用来描述物质或机体的柔韧性(pliant)或伸缩性(elastic), 指物体所具有的弹性, 而后被广泛定义为“回到最初状态”^[1]。人类学学者借鉴生态学家霍林提出的弹持理论, 对社会韧性的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如家田仁^[2]认为, “作为脆弱性相对概念, 应该是内涵具有多

义性的强韧性”, 而韧性除了复原性以外尚有适应性(adaptability)、安定性(stability)、黏着性(cohesiveness)、顽强性(robustness)、宽容性(tolerance)、柔软性(flexibility)、多样性(diversity)。CUTTER等^[3]认为: 韧性是“系统承担灾害冲击、应对灾害事件固有元素及事后调适的过程, 也是促进社会系统重新组织、改变和学习应对的能力。”ROSE^[4]认为, 韧性就是人类主动联结社区以加强应对灾害的能力。MANYENA^[5]认为韧性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在面对灾害风险压力和灾难事件冲击时, 一种潜藏于人类社会文化体系内部的能动反应机制和自我恢复能力。HOLLING与MEFEE^[6]将其定义为在控制系统行为的变量及过程的改变系统改变其结构前可被吸收或容纳的混乱的大小规模。也有诸多学者将脆弱性与韧性作为一组相对概念提出, 对此开展了激烈的讨论^[7–8]。虽然学者们对韧性定义存在分歧, 但存在共通之处, 即: 内生性与主动性, 突出受灾主体的作用, 认为受灾主体作为对环境熟知者, 对灾害发生有一套自然的应对逻辑。

综上, 社会韧性可被理解为既包含一个社会文化体系在遭遇灾害冲击后的自我调适与修复能力, 也包含在面对下一次潜在危险时自身所具有的内部防御能力, 这并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

^{*} 收稿日期: 2022–10–23 修回日期: 2023–04–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ZZ091)

第一作者简介: 杨航(1988–), 女, 汉族, 云南丽江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灾害人类学研究. E-mail: 475841324@qq.com

1.2 民族志田野调查及社会韧性分析视角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于2018—2022年在滇西北金沙江上游(云南香格里拉市与玉龙县交界段)开展田野调查,搜集该区域自然灾害类型及当地群众应对方式方法。重点围绕2018年11月3日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泥石流泄洪洪涝灾害(下文简称“11·03”洪灾)的应对及灾后恢复重建开展调查。调查内容涵盖地方政府及受灾主体在应对灾害前后的应对机制、社会关系、应灾知识以及灾害信息传播等因素。围绕研究主题,在调查前期(应急准备期及救援期)、中期(安置过渡期)、后期(恢复重建期),分别就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发放调查问卷2 000余份;开展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涵盖不同年龄段人群、各行业从业者、不同收入家庭人员。重点调查受灾户217户,853人。按年龄段,60岁以上256人,35~60岁470人,35岁以下127人。按从业类别,务农642人,个体商户70人,教师、企业工作人员43人,基层工作人员18人,中小學生80人,形成谈话资料400余份。通过调查,形成涵盖访谈记录、问卷、地方志资料、民间口传材料、重要文件等田野调查资料10余万字,积累了可靠的一手数据及文本分析资料。

目前人类学关于社会韧性研究主要呈现出基于社区层面自下而上的探讨及政治经济层面自上而下的探讨。

社区层面的探讨。在人类学灾害研究中,社会韧性本身的提出是基于社区内部的自我修复能力,其立足点在于社区的运行逻辑,建立在“小社会”内部能够应对其所面临的各类灾害风险基础上。如大矢根淳^[9], ERIKSON^[10], 李永祥^[11]等都看到了社区韧性的建立是灾害应对的基础。学者们也注意到灾害发生对社区文化的影响以及社区内部应有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尤其在汶川大地震后,学者们关注到了灾害对于受灾主体的冲击以及恢复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除复原物质文化及制度文化外,还注意到了精神文化的复原,灾害与社区韧性、社区适应的研究逐渐增多,包含社会结构^[12]、灾害叙事^[13]、灾害文化解释^[14]等。这些研究的启示是,在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需要注意社区内部自身的特质及运行逻辑,发掘受灾主体在抵御灾害过程中的能动性,避免应急救援中的“家长管理模式”。

政治经济层面的探讨。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在我国体制机制下,基层社区处于一个自上而下的链条之中,不存在完全自生自灭的社区,因此,更加注重把社区融入到一个更大的体系来探讨,包含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有学者注意到^[15],“灾难的应对主要包括灾前的防灾减灾与灾后的赈灾重建两个方面,以及社会整体应对和基层社区防范两个层次。”有学者认为^[16]:“适应能力、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和通信等构成韧性。”而一些学者^[17-19]则根植于中国传统历史,从中发掘我国在应灾中的一些底层逻辑,如灾异观,救灾模式,医患关系,人文关怀等,试图思考对当下的启示。

目前研究既看到了基层社区应对的主动性,也看到了社区之外的结构对社会韧性的影响;既关注到了灾害应对的结果,也看到了缓冲、恢复和应对的过程性。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跳出纯粹的社区韧性,体现出学者们对于西方基于社区内部具备有效运行机制的反思。本研究将结合两种分

析视角,调查文本与数据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将灾害场域作为一个韧性机制营造的场所,在调查基础上,提炼出应灾知识、权力、信息几个因素来理解应灾的社会韧性的构成。

2 应灾社会韧性营造的核心要素分析

2.1 应灾知识

研究区域处于横断山区,山高谷深,各种灾害多发频发且相互叠加,常见灾害有冬春季森林火灾、霜冻,夏秋季山洪及洪涝、冰雹、山体滑坡等。当地群众对灾害应对积累了长期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从神圣到世俗的应灾文化体系,包含了禳灾仪式、不同灾种应对知识、生产的适应性策略、住房防灾等。这些传统知识在应对当地一些常规灾害时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如当地人认为本地小范围的森林山火不是灾害,山火产生的灰烬是农业生产中肥力的重要补充。对于金沙江“三年一小患,九年一大患”,当地人会通过改变种植作物的时间及种类进行防范。在应灾的社会韧性研究中,我国人类学者侧重传统知识的研究,通过丰富的调查,提供了诸多具有本土特点的案例^[20-23]。通过调查发现,传统知识体系也是一个逐渐叠加、更迭的体系,并非固化不变,虽处于较为封闭的环境内,但在经验之上构建传统知识体系仍保留较为完好,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受访者对于新的科学知识体系都持开放接纳的心态。对于摒除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地方知识的效用,也有学者反思本土实践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嵌合衔接问题^[24]。基于调查资料分析,我们认为应灾知识是营造应灾社会韧性的重要因子,而这种知识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本土应灾知识,还应包含依托于专家体系的现代科学知识,以及一切能够用于服务当地人应对灾害的知识。如在“11·03”洪灾中,灾害的时间和灾害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当地人对于水患的原有认知,传统的知识被解构,而依赖现代科学的预警避免了一场更大灾难。了解灾害发生的原因,能够确定防灾所需要的技术性对策的知识,或是像形成能客观把握情况、正确传达信息系统的知识那样,从经验规则中总结出的救灾的基本知识。^[25]

2.2 权力关系

“11·03”洪灾的有效应对是建立在各层级政府自上而下有效联动的基础之上。发布洪灾预警、转移群众、过渡安置,都在统一有效的行动之下方可达成。而政府决策到基层能够有效贯彻,也依托于受灾主体基于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横向关系。此次洪灾中采取的“十户联防”机制在转移群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GIDDENS^[26]将权力归结于两派:主体主义权力观和客体主义权力观。在以往灾害应对研究中,学者们较多关注到了前者,如国家的救灾恢复计划^[27],政策干预^[28],灾后文化保护^[29]等。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后者,如本土生计结构^[30],社区防范^[15]等。本研究中,调查对象无论在交谈中还是在行动中,都对政府充满期待。65%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是政府的事情,作为受灾者本身,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有25%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应对各类灾害,需要政府和受灾主体共同努力;只有1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应对灾害应该主要依靠自身力量。

同时,直接面对灾害的基层社区那种固有的,建立在行动中,能够支配、约束他人行为,使事情能够以自己意志力为转移的能力,在防灾减灾救灾中,尤其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尤为重要。在本次调查的灾害恢复重建期,受灾主体对社区中的“权威人物”赋予了较高的期待,认为社区中的这些“精英”能够带领村民争取更多利益,并保障整个受灾群体权益。因此本研究借鉴 GIDDENS A 对于权力的观点,认为主体主义权力观和客体主义权力共同作用于社会韧性营造。

2.3 信息

信息传播在整合社会关系,改变原有知识传统的同时,也强化了传统社区对于风险的认知。汶川大地震后,学者们注意到了信息传播对灾后重建影响^[31],以及对身份的影响^[32]。在调查中,我们关注到灾害信息的传播对于灾害应对起着关键作用。在“11·03”洪灾应对中,洪灾预警信息提前被受灾主体接收,提前转移以避免巨大灾难。在灾后临时安置点,关于救灾物资发放、灾后互助、灾后防疫知识获取等信息在受灾主体之间传播,增进了共同抗灾、抵御风险的意识。研究重点关注的受灾村落,在此次灾害后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各种网上群组活跃程度远高于平常,所调查的受灾村落 217 户家庭,其成员在村内的微信群达数十个,包含全村群,各小组群,亲戚群,同龄人群,青年群,妯娌群等等。在恢复重建期,各种关于重建的信息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在村民间传播,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受灾主体关注到的信息,包含基于现代通信技术的媒介如手机、电脑、电视等承载的信息,也包含基于群体内部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播的信息。受灾主体还关注到了与灾害相关的信息,包含了影响应灾行为的信息、影响灾害记忆形成的信息以及影响灾害观念形成的信息。

3 应灾知识、权力、信息对应灾社会韧性的影响

3.1 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相融合

调查发现,人们所动用知识和原本基于传统经验的知识有着明显的区别,显示出其叠加性与杂糅性。叠加主要体现在各年龄层的差异方面,呈现出从老年到中年再到青年,传统知识保有递减,科学知识接受度提高的特点。调查中,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主要知识来源于生产生活经验,而 35 岁以下青年人群,95% 以上受访者所积累的知识来源于科学教育。杂糅主要体现在村落内部不同职业人群之间,从事传统农业和从事商业、教育、管理的人员,所保有的知识相混融,如在水患应对中,从事农业的人员相较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具有更丰富的传统知识,这些知识以神话、谚语、日常仪式为载体。本案例中,在应对常年金沙江水患上,当地群众有一套应对经验,而面对超出当地认知的巨灾如“11·03”洪灾发生时,则需要依靠科学的预警防范机制介入。在灾后过渡安置时期,受灾主体更为熟知本土环境,利用日常积累的行动模式,诸如清淤、饮食起居安排方面,不需要统一动员,人们便能自觉形成分工,有助于平稳度过安置期生活。在恢复重建期,为充分尊重受灾主体意愿及考虑不同家庭的

经济状况,当地未采取一刀切的重建模式,而是采取进城货币安置,住房原址拆除重建,易地搬迁新建,受损局部修缮等方式,调查的 217 户人家,仅有 1% 选择进城安置,其余 85% 的人家选择原址重建房屋,14% 的人家选择局部修缮。重建的房屋有 80% 从传统砖木结构变成了砖混结构房屋,受灾主体需要更快接受新的建筑知识。

当前发生的很多灾难超出地方基层群众的经验认识和应对能力范围,特别在预防应对一些新兴灾难之时,地方传统的知识经验局限性凸显,所以引入现代科学的技术手段与组织制度来修正补充或引导重构地方的应灾实践机制极为必要^[33]。应灾知识对于构建应灾社会韧性的作用,不是简单的某种知识体系的效用,要看到灾后社区中的人们对于这些知识体系的认同度与接纳程度,在“大应急”体系下,各类应灾知识逐渐吸纳、规范为科学体系,如何有效接纳各种知识并形成共识机制,是深入社会韧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灾发生阶段与重建阶段,本土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不断交替、融合方能构成一个地方社会的韧性。

3.2 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交织

本研究中的受灾主体在应灾过程中,一方面处于接纳、服从安排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体现出对自身利益的主动争取。调查发现,一个组织结构本身具有复杂性与交互性,多种关系杂糅在一起,形成一种多链接的机制,能吸纳更多外来的社会关系融入其中并且被有效运用在应对灾害过程中,尤其在恢复重建阶段,社区内部基于血缘、地缘长期形成的非正式权力关系依然发挥着作用。亲缘关系广、邻里人际好的家庭应对风险能力明显较高,村落中的元、舒、和几个大姓家庭占比达到了 80%,而村中姻亲关系复杂,在村内有姻亲关系的家庭占比为 88%,在应对灾害过程中,几个大姓及姻亲关系广的人家所能得到的社会资源明显大于其余家庭,突出体现在恢复生产及房屋重建进度上。基层社区的“权威人物”在调解纠纷、移风易俗、重聚人气方面具有突出表现。基于业缘及趣缘的新型人际网络也发挥着补充作用,有子女在“单位”,朋友多的家庭,在物资及人力上得到更多支持。

应灾权力关系,在应对不同灾害程度及在应灾的各个阶段动态调整。从灾害发生前后的短时间到恢复重建的长时段中,不同的权力关系扮演着相应的角色。我国的应急管理模式与西方社会的显著差异在于,西方社会有成熟 NGO 组织、教会和地方社团来承担灾后救助。而我国,从先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再到现代,灾害应对,特别是巨灾应对一直都是以国家机制为主导的应对系统。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背景之下,应对巨灾,脱离国家机制,地方社会应灾的韧性难以成立。另一方面,国家动员机制要下沉到基层,必须通过基层组织,基层组织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内部纵横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

3.3 灾害信息接收与再传播

调查发现,本研究受灾主体智能手机保有量接近 90%,微信群及各种短视频平台等被广泛运用于灾害信息传播。科学预警、灾后救援救助、防疫、恢复重建等信息如何有效进入社区,社区如何消化吸收并产生正向效果,应成为关注的重点。在本研究中,受灾村民迫切需要获取各类灾

害信息,并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将自身境况及需求广泛传播出去。对信息的再生产,基于村民原有组织经验体系,会凸显出村民组织内部的韧性,比如在过渡安置期内的互帮互助、互通有无;而在信息不对等以及资源不均的情形下,会产生谣言,使得村民内部出现分裂,关系走向脆弱,从而降低应灾韧性。此外,应灾知识、权力、信息之间需构成一个良性互动关系方能提升应对灾害的社会韧性。知识多依赖各种信息载体获得,但错误的信息会导致地域社会的误解和矛盾,进而破坏社会韧性,而产生错误信息的原因则由知识结构和关系的特征所决定,面对纷繁多样的信息,如何选择、辨别,这背后也隐藏着经验背景及权力关系(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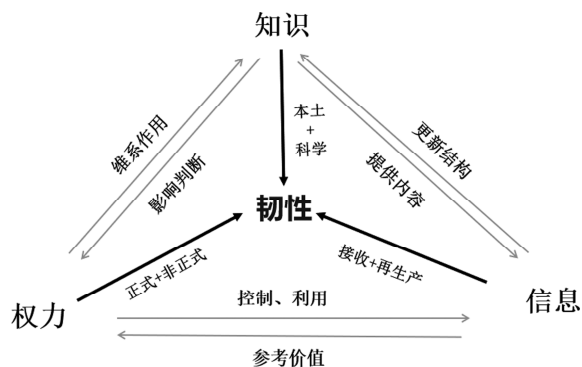


图1 知识、权力、信息与韧性之间的关系

4 结论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通过调查文本及数据,对应灾知识、权力、信息与应灾社会韧性之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认为,应灾知识、权力关系、信息传播三者共同作用于应灾的全过程,三者间也相互作用、制衡。在灾害应对过程中,需统筹考虑灾害发生地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应对方式及专家体系对于防灾减灾的指导作用。在行动方面,需在充分贯彻各层级政府应急救援方针的同时,注重基层自身协调能力,调动基层作用。在灾害信息传播与使用方面,需注重信息的对等接受与合理再生产。对于应灾的社会韧性研究,也需要区分常态灾害与非常态巨灾,在人们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与行为逻辑,用以应对常发灾害,这种体系也纳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构造中。而面对超出这套知识体系所能应对的巨灾发生时,忽略国家体系及专业救援力量去讨论社区韧性显然不符合实际。在韧性机制探讨中,除要挖掘社区的内在原动力外,更需要关注到面对不同灾害时,社区是否具有同样的自我修复能力。

参考文献:

- [1] 汪辉,徐蕴雪,卢思琪,等.恢复力、弹性或韧性?社会—生态系统及其相关研究领域“Resilience”一词翻译之辨析[J].国际城市规划,2017,32(4):29-39.
- [2] 张曦.汶川经验:对口支援与脆弱性/恢复力[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04-110.
- [3] S L CUTTER, L BARNES, M L BERRY. A place-based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natural disaster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8, 18(4):598-606.
- [4] ROSE A. Defining and measuring economic resilience to disasters[J].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4, 13(4):307-314.
- [5] MANYENA S B.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revisited[J]. Disasters, 2006, 30(4):434-450.
- [6] HOLLING C S, MEFFE G K.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the path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J]. Conservation Biology, 1996, 10(2):328-337.
- [7] TIMMERMAN.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Society: A Review of Models and Possible Climatic Applications[M]. Toronto, Canada: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1.
- [8] 玛拉·贝纳杜禧,白哈,塞雪莹.灾难管理中的两面神雅努斯:仍有脆弱性,但已具弹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8(2):24-34.
- [9] 大矢根淳,浦野正树,田中淳,等.灾害与社会-1-灾害社会学导论[M].蔡麟,翟四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0] ERIKSON K. A new species of trouble: explorations in disaster, trauma, and community[M]. New York: Norton, 1994.
- [11] 李永祥.迈向以社区需求为导向的防灾减灾研究:写在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J].云南社会科学,2018(5):1-9,185.
- [12] 夏少琼.浴火重生:灾难、重建与社会变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 [13] 王晓葵.“灾后重建”过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以灾害记忆为中心[J].河北学刊,2016,36(5):161-166.
- [14] 王海燕.共同体的生命之流:岷江上游羌村社区的灾难人类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
- [15] 张原,汤芸.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及其学术定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2(7):13-18.
- [16] 周利敏.从社会脆弱性到社会生态韧性:灾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型[J].思想战线,2015,41(6):50-57.
- [17]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0:361.
- [18]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19] 余新忠.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初探[J].史学集刊,2021(2):19-24.
- [20] 李永祥.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 [21] 多吉党增.从社会变迁看若尔盖麦溪地区生态的脆弱性诱发与弹性营造[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19.
- [22] 张原,汤芸.赈灾抢险中的社会弹性韧性机制:汶川5.12大地震中阿尔村应急赈灾行动的人类学考察[J].云南社会科学,2018(5):10-16,185.
- [23] 叶宏.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人类学语境中的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和当代实践[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12.
- [24] 汤芸.西南古村镇火灾肇因与消防实践的人类学研究:基于贵州侗族村寨的探讨[J].思想战线,2015,41(2):31-36.
- [25] 樱井龙彦,陈爱国.灾害民俗学的提倡[J].民间文化论坛,2005(6):62-70.
- [26]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M]. London: Macmillan, 1981.
- [27] 陈世栋.废墟上的契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4.
- [28] 卢阳旭.灾害干预与国家角色: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过程的社会学分析[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 [29] 李大舟,张世均.“汶川大地震”对民族文化保护的影响:以地震中的羌族文化为例[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22(4):75-77,86.
- [30] 乌尼尔.与草原共存:哈日干图草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 [31] 蒋彬,吴定勇.传媒议程设置与震后羌族文化重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9):171-174.
- [32] 肖坤冰.媒介参与:大众传播语境下的羌族族群性建构:以5·12汶川地震后川西羌区为考察中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9):175-178.
- [33] 张原,马浪.知识图景中的灾难考察: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关键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4(8):10-15.